

集群的内部治理结构形式及其 对集群升级的影响研究

汪 斌 廖园园 陈海达

(浙江大学 经济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27)

[摘 要] 根据浙江省地方产业集群的调研,集群的内部治理结构可以分为准层级、短距离市场、短距离市场+准层级三种类型。一般而言,具有短距离市场治理结构的集群,工艺和产品升级比较缓慢,其主要原因是集群内的中小企业缺少合作与联系;如果能有一个强有力的行业协会引导企业间的协作,则集群具有较大的升级潜力。准层级治理结构的集群中,如果大企业具有绝对领导权,则集群工艺和产品升级容易实现,但中小企业易被锁定在生产环节;如果大企业的权威性不显著,则中小企业间容易产生恶性竞争,影响升级。短距离市场+准层级治理结构是上述两种情况的综合,具有这种治理结构的集群一般都有大型的专业市场,如果专业市场竞争有序,则集群具备实现整体升级的优势;反之,专业市场可能会演变为“柠檬市场”,使整个集群的发展陷入信誉危机。

[关键词] 集群; 内部治理结构; 升级

Internal Governance Structure of Clusters and Its Impact on Industry Upgrading

Wang Bin Liao Yuanyuan Chen Haida

(College of Economic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on the industry clusters of Zhejiang Province, a cluster's internal governance structure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three types: Quasi-hierarchy, Arm's length market as well as Quasi-hierarchy and Arm's length market. Generally speaking, market-based clusters suffer from slow process of product upgrading for the isolated relationship and lack of cooperation among small medium sized enterprises (SMEs). They would show the great upgrading potential providing that SMEs are guided to collaborate efficiently by a strong trade association. Clusters with the Quasi-hierarchy governance structure are likely to lead to fast upgrading in technology and products if the large enterprises hold the absolute leading position, but the SMEs would be locked in production link. In the absence of powerful large enterprises, blind competition may appear among SMEs and hinder upgrading. Quasi-hierarchy and Arm's

[收稿日期] 2007-09-29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基金项目]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 2005 年度规划重点资助项目(Z05 YJ03)

[作者简介] 1. 汪斌,男,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产业经济理论与政策方面的研究; 2. 廖园园,女,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产业集群方面的研究; 3. 陈海达,男,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地方政府竞争与管制理论研究。

length market governance structure which usually equips with a large-scale specialized market is a synthesis of the two above-mentioned inner governance structures. Only enterprises in the specialized market compete orderly, could interactive development be realized between the large enterprises and SMEs, which will gradually lead to the overall upgrading of the cluster. Otherwise the specialized market might deteriorate into lemon market, which will driv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luster into a credibility crisis. Therefore, upgrading of such clusters postulates the upgrading of the corresponding specialized markets.

Key words: cluster; internal governance structure; upgrade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产业集群作为一种典型的经济活动空间组织现象,成功地演绎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模式。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学者们发现不同的产业集群显示出不同的生命力。有的集群在全球竞争中继续繁荣,有的则后劲不足甚至走向衰退和终结。在此背景下,产业集群如何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并进一步实现升级,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从内部治理结构角度出发,研究不同内部治理结构对集群在全球价值链上升级的影响。

一、关于地方产业集群治理及升级的文献综述

产业集群治理研究尚未建立起统一的分析框架,学者们对集群治理涵义的理解也各有偏重。例如,有学者认为,集群治理是集群行为主体有目的的集体行动;Brown 则把它看做是产业结构和集群企业间的互动关系^[1]。在此基础上,黄喜忠、杨建梅把集群治理总结为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与规范不断协调集群中所有利益相关者(既包括集群内部价值链上的所有参与者,也包括与集群相联系的外部市场与机构)的行动^[2]。本文较赞同这个观点,根据该定义,地方产业集群治理可以清楚地分为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两类。

外部治理主要是指全球价值链治理,这方面的研究比较集中,大部分文献都是在分析全球价值链的治理结构对集群升级的影响。Humphrey 和 Schmitz 是较早开始研究且影响力较大的学者,他们认为治理是企业之间的关系和制度机制,通过这些关系和机制对价值链上的活动进行非市场性质的协调^[3]。因此,根据全球价值链上不同主体间权力对称程度的不同,他们把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分为市场型、网络型、准科层型、科层型四种类型,并通过实证研究及演绎推理,总结出不同治理模式对集群升级的影响^[4]。之后,不少学者对该理论进行完善,逐步使全球价值链治理成为研究地方产业集群升级的主要理论之一。

关于内部治理的研究则比较分散,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1) 集群内部治理的内涵^[5]; (2) 内部治理与外部治理的比较^[6]; (3) 内部治理类型等^[7]。集群内部治理与集群升级之间的关系则鲜有涉及。早期学者在研究集群升级问题时,强调集群内部治理对集群升级的重要性^[8-9],但并没有探究集群内部治理与升级的内在关系。

然而,在对浙江地方产业集群进行调研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即使嵌入同种治理模式的全球价值链,集群所表现出来的升级路径及模式也明显不同。究其原因,本文认为地方产业集群的内部治理结构对集群的升级有显著影响。

二、浙江地方产业集群的内部治理结构类型

内部治理结构原本是管理学上的概念,是指以产权为主线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本文借鉴全球价值链治理结构的理论,把内部治理结构这一概念引入集群内部治理,用以反映集群内企业之间的关系状态。集群内部治理的效率由网络治理机制和内部治理结构共同决定。网络治理机制是指协调集群内部各经济主体之间关系的制度与规范,内部治理结构则根据集群内部企业网络的所有权集中程度和协作程度而区分为不同的类型,网络治理机制体现在内部治理结构中。本文从集群内同类企业的合作竞争关系、上下游企业间分工协作方式、上下游企业间的协作程度、集群内部供应链的跨链合作情况、产业链的完整性等五个方面来考察浙江地方产业集群的内部联系,进而确定其内部治理结构类型(见表 1)。

表 1 浙江地方产业集群的内部联系和治理结构类型

所在区县	集群名称	集群内同类企业间的合作竞争关系	集群内部联系				集群内部治理结构					
			上下游企业间分工协作方式		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协作程度		集群内部供应链的跨链合作情况		产业链的完整性	治理结构		
			外包	非订单生产	稳定紧密	松散	有	无	短距离市场	准层级	网络	
高新区	软件	合作多于竞争								较完整		
	通信设备制造	竞争多于合作								较完整		
	动漫游戏	竞争								较完整		
余杭区	家纺	竞争多于合作								较完整		
	服装	竞争多于合作								完整		
萧山区	纺织	合作、竞争								完整		
	羽绒	合作、竞争								完整		
	汽车零配件	竞争多于合作								较完整		
	钢构	合作、竞争								较完整		
富阳市	造纸	竞争								不完整		
	通讯光缆	竞争多于合作								较完整		
桐庐县	制笔	合作、竞争								较完整		
	针织	合作、竞争								不完整		
临安市	节能灯	竞争多于合作								不完整		
海宁市	皮革	合作、竞争								较完整		
平湖市	光机电	竞争								不完整		
绍兴县	纺织	合作、竞争								完整		
龙湾区	塑料	合作、竞争								较完整		
鹿城等区县	鞋业	竞争多于合作								完整		
苍南县	印刷	竞争多于合作								较完整		
乐清市	电气	竞争多于合作								完整		

注:本表由课题设计调查表的各产业集群调研报告整理所得。

从表 1 可以看出,浙江地方产业集群的内部治理结构有下列三种类型。

(一) 基于权威的准层级治理结构

浙江地方产业集群中,具有这种内部治理结构的集群广泛存在。从表1中可看出,高新区通信设备制造,萧山羽绒、汽配,余杭家纺、服装,桐庐针织和乐清电气7个集群具有这种治理结构。在这类集群中,一般都有几个规模较大的核心企业,其周边集聚了一



图1 准层级治理结构

大批依托核心企业进行生产经营的中小企业(见图1)。虽然这种联系只是业务上的联系,不涉及股权上的控制,但许多中小企业的生存发展已离不开这些大企业。例如乐清电气集群,该集群内存在着德力西、正泰等超大型企业,而许多中小企业通过为这些大企业提供各种加工或服务获得生存空间。

(二) 基于价格机制的短距离市场治理结构

从表1可知,浙江地方产业集群中,具有短距离市场治理结构的集群有高新区软件、动漫,富阳造纸、通讯光缆,临安节能灯,桐庐制笔,平湖光机电,龙湾瓯海塑料和苍南印刷9个产业集群。这些集群内,企业在空间上相距很近,可通过当地市场寻找自己所需的各种原材料或中间零部件,集群内上下游企业双方不是以紧密合作关系进行研发、生产和销售活动的,而是以市场为载体来沟通集群内不同主体之间的各种交易。企业之间分工精细,业务相对比较独立(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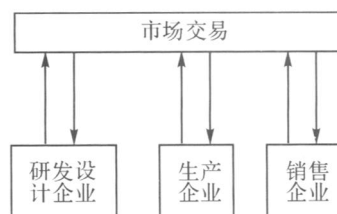


图2 短距离市场治理结构

(三) 短距离市场 + 准层级治理结构

在调研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浙江部分地方产业集群的内部治理结构有别于上述两种类型,既体现出短距离市场治理结构的特征,又具备准层级治理结构的特点,是这两种治理结构的综合。萧山纺织、钢构,海宁皮革,绍兴纺织和温州鞋业5个集群具有这种治理结构。这些集群中有龙头企业,但占绝大多数的还是中小企业。部分中小企业依托龙头企业进行生产,为他们提供加工或服务,业务上相对附属于龙头企业,因此他们之间是准层级治理结构。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小企业而言,他们通过集群内部的市场交易来各取所需,完成自己的生产,彼此之间在业务上相互独立,因此这部分中小企业体现出来的是短距离市场治理结构。这两种治理结构在同一个集群中都有明显的体现,而且不以任一种为主,所以我们把这种情况总结为:短距离市场 + 准层级治理结构。

三、集群内部治理结构对集群在全球价值链上升级的影响

调研的21个浙江地方产业集群全都是嵌入准科层型全球价值链,但是他们的升级路径及模式不尽相同。因此,本文接下来重点分析不同内部治理结构对集群的升级有何不同影响。

(一) 短距离市场治理结构对集群升级的影响

一般而言,短距离市场治理结构的集群中,企业的规模都不大,实力比较平均,缺少具有强大影响力和号召力的龙头企业。而且由于实力不强,企业一般只能为准层级链上的治理者做简单的贴牌生产,学习对方先进生产技术或工艺的机会不大,因此集群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比较缓慢。但这类集群在升级方面的劣势并不完全因为企业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集群内中小企业间的孤立。集群内中小企业数目众多,同类产品的差异性不大,生存空间很小。为了获得价值链上领导企业的业

务,它们竞相压价,使得集群内部几乎形成了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产品的价格接近于边际成本,企业的利润也处于很低的水平,更不用说投入有关要素进行工艺和产品方面的升级。而这又导致价值链上的治理者只能把最简单、最没有技术含量的工序外包给该集群,从而造成了恶性循环。

但是,如果在一定的环境下,集群内众多相互关联的中小企业进行协作创新,可以实现企业间的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和风险共担。例如,建设集群区域品牌,增强集群的影响力;积极推进供应链式整合,提高集群整体对价值链上治理者的吸引力,追求低成本以外的可持续竞争优势,提升外包生产的档次,努力实现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共同打造具有较强影响力的“统一品牌”(各个独立小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都使用该品牌,例如意大利费留椅业产业集群),力求中小企业集群的功能升级,而且这类集群的产业链一般都比较完整,具有提升集群功能的潜力与优势。但是,中小企业之间合作竞争关系的维持需要一个高于企业并与集群密切相关的机构来管理,集群内的行业协会应该是最合适的选择。所以,短距离治理结构集群的良好发展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行业协会。

例如,桐庐分水镇制笔产业集群的规模较小,年产值二十多亿元,制笔企业和配套企业共有八百多家,平均每家企业的产值只有两百多万,规模最大的企业年产值也只有几千万元。企业间有明显的恶性竞争现象,而集群也正是以低价格为竞争手段嵌入准层级全球价值链,为其他企业做简单贴牌生产,获取极低的利润。该集群嵌入准层级链的程度较深,但是长期以来一直被锁定在生产环节,贴牌生产这么多年,仍然不具备生产油墨和笔珠的能力,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的进程非常缓慢。在升级的压力下,分水镇政府出面组建了以集群内企业家为主要成员的制笔行业协会,整治压价竞争现象,整合集群供应链。目前,该集群虽然规模不大,但具有较完整的产业链,细致的社会化分工,并且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间分工合作紧密,逐步形成了一个以分水镇为中心的集生产、加工、市场、配套、技术、人才、信息为一体的低成本、低价位区域,已基本实现从原料供应、元件配套、模具设计、加工生产到产品包装、销售的一条龙服务。这种整体优势逐渐被准层级链上的领导企业发现,目前几个合资项目正在洽谈当中,这对该集群的发展而言是一个实现功能升级的契机。

(二) 准层级治理结构对集群升级的影响

准层级治理结构的集群中,大企业和与其密切关联的中小企业形成金字塔式的企业群落。在这个金字塔中,大企业在金字塔的顶端,起着支配性或主导性作用,而广大中小企业则主要为主导企业提供专业化生产和配套服务。集群内企业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上下游的分工合作关系,不同层次企业间有一定的依赖性。在集群升级的过程中,大企业发挥着关键作用。大企业的实力一般比较强大,具备获得价值链上治理者的较高层次外包业务的能力与渠道,并且比较容易在外包生产的过程中实现工艺和产品升级。

如果大企业足够强大,在集群中有绝对领导权,则其与中小企业会建立紧密的分工合作关系,众多中小企业在生产上接受其调配与间接管理,集群内部的竞争比较有序。这种情况下,中小企业跟随大企业或多或少地实现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而大企业则可以借助集群整体的生产优势,在推行品牌战略的过程中逐步实现功能升级,但是广大中小企业容易被大企业锁定在生产环节而难以实现功能升级。

例如,在萧山汽配产业集群中,万向集团和亚太机电两个大型龙头企业在全国乃至世界都有较大的影响力,对集群内的中小企业具有绝对的领导和控制能力。大量的中小企业为其做不同工序的配套生产,各司其职,相互之间是合作竞争关系。近年来,随着这两个龙头企业的工艺和产品升级,整个集群产品的质量和档次都有了明显的提高。而且万向已经由二级供应商向一级供应商迈进,逐渐实现功能升级。但是,正如上述所述,绝大部分中小企业仍然停留在生产环节,表现出生产锁定的迹象。

反之,如果大企业在集群内的核心领导地位不是很凸现,与特定中小企业的分工协作关系不固定,则众多中小企业会为了争取大企业的外包订单而压价竞争,从而无力投入中间产品的研发和创新。这导致中间产品差异化程度逐渐降低,也直接影响最终产品的差别程度及其区域品牌的打造,进而影响大企业的功能升级。而对于单个中小企业而言,由于不能持续获得大企业在产品工艺和质量方面的指导与培植,加上企业间的恶性竞争,工艺和产品升级缓慢。这种情况下,行业协会的协调管理职能显得尤为重要。

例如,桐庐针织产业集群,该集群的几家大企业主要为国际品牌做贴牌加工,其余240多家中小企业为这些大企业做配套生产。大企业在集群中不具有绝对领导地位,不能完全引导和支配中小企业的生产行为,而中小企业为了获得大企业的外包业务,竞相压价。大企业也正是利用这种恶性竞争获取低价优势,从而保持贴牌加工的业务。这种治理结构虽然能保持集群的生存,但导致集群升级进程十分缓慢。目前,该集群机器设备老化,先进设备的进口比例只有0.29%,能自动化生产的机器也不足5%,生产效率十分低下,相关科研方面的投入也微乎其微,产品质量没有新的突破,且大企业的自有品牌很少,远不具备功能升级的能力。这种集群的发展具有较大的隐患,如果链上治理者压低价格,或者其他国家或地区出现成本更低的类似集群,该集群的生存极有可能面临很大的威胁。事实上,不少集群的消亡走的就是这种路径,例如永康保温杯集群。

(三) 短距离市场 + 准层级治理结构对集群升级的影响

这种治理结构是上述两种情况的综合,集群中大企业和众多中小企业并存,部分中小企业长期为大企业做配套加工,其余大量中小企业依托集群内专业市场自行生产销售。由于生产和销售不需要完全依赖大企业,中小企业之间很少出现为了争取大企业的订单而恶性竞争的情况;相应的,大企业对集群的控制力也比较有限。这种集群一般都有大型的专业市场,而且根据专业市场发展状况的差异,集群的发展呈现两种趋势。

一种情况是广大中小企业为了争取专业市场的客户,不惜低价出售,甚至以次充好,假冒伪劣盛行,而大企业由于控制力有限不能对这种现象及时加以制止,专业市场逐渐变成“柠檬市场”。其负面影响通过专业市场的窗口作用被迅速放大,直接影响集群的区域品牌,进而影响大企业的品牌建设,整个集群的发展陷入信誉危机。另一种情况是建立专业市场的监督管理机构(一般由行业协会来执行),通过采取系列措施提升专业市场的档次和影响力,进而提高集群区域品牌的竞争力。例如对专业市场设置一定的进入壁垒,维持市场产品质量水平;严厉打击恶性竞争行为;引进国际大型、高端客户等。为大企业做配套加工的中小企业在随大企业实现工艺和产品升级后,可以转而通过专业市场独立生产销售,或为链上的高端客户做贴牌生产,从而打破大企业的锁定,嵌入全球价值链;而大企业则继续在集群中寻找配套的中小企业,周而复始,逐渐实现集群整体工艺和产品升级。而且,大企业可以利用集群整体的品牌影响力,提升自身品牌价值,实现功能升级;专业市场中的中小企业也可能随着市场档次的提高而遇到功能升级的机会。因此,短距离市场 + 准层级治理结构的集群升级与专业市场的发展密切相关,集群的升级必须以专业市场的升级为前提。

海宁皮革产业集群的发展经历了上述两种情况。该集群目前有卡森实业、蒙努集团、雪豹集团等十几家亿元规模以上的大型企业,2000多家中小企业,其专业市场——海宁中国皮革城远近闻名。1994年,皮革城开业后,连续三年皮装“牛市”,但是到1997年危机初显。由于缺乏管理,加上中小企业趋利短视的先天特点,市场内压价竞争十分严重,许多中小企业为了降低成本,纷纷使用低价劣质皮,产品档次不断下降,海宁皮衣变成了“假皮衣”的代名词。从1998年开始,海宁皮革集群进入发展的低谷期。与此同时,海宁政府在集群升级的压力下出面设立管委会,对皮革城进行大刀阔斧的整治,制定严格的“入城”标准;严厉惩治假冒伪劣和低价竞争;引大企业进驻,提升皮革城

档次;不断完善皮革城的配套设施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整改后的皮革城焕然一新,集群也从 2002 年开始重新焕发活力。目前,皮革城年销售额达集群总销售额的一半以上,充分发挥了其作为中小企业销售平台的作用。管委会每年举办中国皮革博览会暨全国皮革服装展销会,扩大了皮革城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吸引了价值链上的高端客户。借助专业市场,不少中小企业实现了从为大企业做外包生产到独立为价值链上的领导企业做贴牌生产的角色转换,并在工艺和产品升级的过程中不断扩大自身规模。截至 2005 年底,海宁皮革产业集群规模以上企业数目由原来的几十家增加到 129 家。借助区域品牌的影响力,集群内的大企业也在努力打造国际知名名牌,向功能升级迈进。

其他具有短距离市场+准层级治理结构的集群也都具备了发达的专业市场,像温州制鞋集群的鞋类批发市场、萧绍纺织集群的轻纺城,而且基本上都已实现了工艺和产品升级。

在以往的研究中,发展中国家集群的升级路径似乎已经有了定论:工艺升级、产品升级最先顺利实现,功能升级受限制,最后是可能性极小的链升级。本文从集群内部治理结构角度证明了同是嵌入准科层全球价值链,由于内部治理结构不同,集群的升级路径会有很大的差异;即使是同种内部治理结构,受集群内企业合作程度、大企业的领导能力、专业市场的完善性等因素的影响,集群的发展趋势也会明显不同。此外,当集群处于下列情况时,行业协会是否发达对集群的发展升级至关重要:具有短距离市场治理结构,但集群内中小企业间竞争恶劣;具有准层级治理结构,但大企业的领导地位不显著;具有短距离市场+准层级治理结构,但专业市场不够发达。对于行业协会在集群内部治理结构中的地位及具体作用,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未作深入分析,有待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探讨。

[参 考 文 献]

- [1] R. Brown, *Cluster Dynamic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with Application to Scotland*, Glasgow: Strathclyd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2] 黄喜忠、杨建梅:《集群治理的一般性研究》,《科技管理研究》2006 年第 10 期,第 51-54 页。[Huang Xizhong & Yang Jianmei, *Universal Study of Cluster Governan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Research*, No. 10(2006), pp. 51-54.]
- [3] J. Humphrey & H. Schmitz, *Governance in Global Value Chains*, *IDS Bulletin*, Vol. 32, No. 3(2001), pp. 19-29.
- [4] J. Humphrey & H. Schmitz, *How Does Inser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 Affect Upgrading in Industrial Clusters?*, *Regional Studies*, Vol. 36, No. 9(2002a), pp. 1017-1027.
- [5] 朱华友、丁四保:《产业集群治理:一个基于浙江省企业社会责任实证的视角》,《经济地理》2006 年第 6 期,第 997-1000 页。[Zhu Huayou & Ding Sibao, *Industrial Cluster Governance: From the View of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Enterprises in Zhejiang Province*, *Economic Geography*, Vol. 26, No. 6(2006), pp. 997-1000.]
- [6] 杨慧:《产业集群治理分析框架初探》,《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6 年第 5 期,第 102-108 页。[Yang Hui, *A Brief Framework of Industrial Cluster Governance*, *Science of Science and Management of S. & T.*, No. 5(2006), pp. 102-108.]
- [7] 朱允卫:《企业规模、集群结构与技术创新优势》,《经济地理》2004 年第 2 期,第 187-191 页。[Zhu Yunwei, *Enterprise Scale, Structure of Cluster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dvantages*, *Economic Geography*, Vol. 24, No. 2(2004), pp. 187-191.]
- [8] H. Schmitz, *Global Competition and Local Cooperation: Success and Failure in the Sinos Valley, Brazil*, *World Development*, Vol. 27, No. 9(1999), pp. 1627-1650.
- [9] J. Meyer-Stamer, *Path Dependence in Regional Development: Persistence and Change in Three Industrial Clusters in Sanata Catarina, Brazil*, *World Development*, Vol. 26, No. 8, (August 1998), pp. 1495-1511.